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十二期
2015.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第十二期
2015. 12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第十二期/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301-27239-8

I. ①國… II. ①北… III. ①漢學—研究—世界—文集 IV. ①K207.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148404號

- 書名**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十二期)
GUOJI HANXUE YANJIU TONGXUN
-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 編
- 責任編輯** 翁雯婧 武芳
-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7239-8
-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 電子信箱** zpup@pup.cn
-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 經銷者** 新華書店
- 720毫米×1020毫米 16開本 26.25印張 450千字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定價** 68.00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榮新江

委 員(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名):

白謙慎(美國波士頓大學)

程郁綴(北京大學)

程章燦(南京大學)

傅 剛(北京大學)

寇致銘(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

李 零(北京大學)

李 慶(日本金澤大學)

劉玉才(北京大學)

馬辛民(北京大學出版社)

潘建國(北京大學)

齊東方(北京大學)

橋本秀美(北京大學)

榮新江(北京大學)

商 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王 博(北京大學)

徐 俊(中華書局)

楊繼東(美國斯坦福大學)

袁行霈(北京大學)

張志清(中國國家圖書館)

趙 超(中國社會科學院)

鄭吉雄(香港教育學院)

主 編 劉玉才

目 錄

漢學論壇

- 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 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著 周雯譯/3
粟特文《聖喬治受難記》與《吉思咒》
——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研究 馬小鶴/45
再論奚人在“重元之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尤 李/76
那不勒斯中華書院及其漢語教學
佳美琳 (Miriam Castorina) 撰 王衆華譯/89

文獻天地

- 西陲出土日藏《左傳》昭公殘卷兩種 白石將人/105
日藏南化本《史記》寫本學研究序說 王曉平/121
畫出猴王：崇禎本《西游補》插圖研究
何谷理 (Robert E. Hegel) 撰 傅松潔譯/139
《王時敏與王翬信劄七通》考釋
——兼論稿本信劄在藝術史研究中的文獻意義 白謙慎 章暉/155
李文田手稿的再發現：國圖藏《四庫全書表注》初探 苗潤博/197
北堂圖書館藏書的分流 (1958年以後) 趙大瑩/203

漢學人物

- 譚唐傳奇：全球化時代的個體生命 陳懷宇/229
杜希德先生 (1925—2006) 生平
麥大維 (David McMullen) 撰 李丹婕譯/288

馬可·波羅研究

- 大汗的占卜師：蒙古帝國征服戰爭中的軍事數術零拾 周思成/309
- 解開“馬可·波羅地圖”之謎 馬曉林/321
- 紀念楊志玖先生誕辰一百週年暨隋唐宋元時期的中國與世界
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沈伏瓊/328
- “馬可·波羅與絲綢之路”揚州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馬曉林 求芝蓉/331

研究綜覽

- 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譯後記 丁俊/339
- 柏夷《道教研究論集》評介 劉屹/350
- 作為文化史的繪畫史
——評石守謙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
與《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 李鈞/370
- “中國古典文獻的閱讀與理解——中美學者對話”討論會綜述 蔡丹君/383
- 海盜與東亞世界：以近年來港澳地區兩次國際學術會議為中心
胡簫白/388
- “李白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孫文傑/396

基地紀事

- 國際漢學系列講座紀要(2015.07—2015.12) /407

徵稿啓事

/413

漢學論壇

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

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著

周 雯 譯

造紙術與印刷術，這兩項中國人的發明，對我們西方文明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沒有它們，就沒有既廉價又能廣泛流通的書籍及其所承載的知識，也就沒有我們現在的世界。

紙的發明

沒有紙，印刷術便不可能付諸實踐。傳統上認為紙張可能濫觴於中國西部，並把它的發明歸功於生活在公元1世紀的宦官蔡倫。在19世紀下半葉，考古發掘發現幾處早期粗紙的遺存。考古學家據此推測，至遲至漢武帝時期（前140—87），紙張就已經開始使用了。但是，這些早期的紙，大多由麻的纖維製成，質地非常粗糙，大概不能用於書寫，僅僅只能用來包裝物品。而蔡倫紙改用碎絲綢作為造紙的原料，之後又加入桑樹皮、破漁網及其他各種不同來源的天然纖維。我們知道，在蔡倫發明紙之後，人人都開始使用這種新型的書寫材料。現在已知最早的書寫在紙上的文件，在氣候乾燥的內蒙古和新疆地區被發現，為公元2世紀的遺物。這是在公元105年，蔡倫向皇帝獻上他

譯者學習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中國中古時期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為杜希德先生(1925—2006)1977年在英國印刷學會(The Winkyn-de Worde Society)作的一次演講，後於1983年出版成書。

發明的紙之後不久。不管是造紙的技術，還是紙張使用的範圍都發展得非常迅速。到了公元4世紀，紙張已經基本上完全替代了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使用的書寫材料——單行書寫的竹簡、木牘，以及縑帛。到4世紀，紙張的足跡已經遠至吐魯番盆地；至公元500年，紙張在中亞的各個地區也被廣泛使用。其後的公元8世紀，紙張由中國的戰俘帶給了撒馬爾罕地區的阿拉伯人，到公元800年，巴格達一帶就能開始自己造紙了。歐洲從阿拉伯世界學會了如何造紙，這大約是公元11世紀的事。

在發明紙張的國度中國，至唐代(618—907)，造紙已經成爲一門藝術；造紙業成爲一個巨大的產業，生產製造各種各樣精美的成品紙。20世紀初，大量5世紀到12世紀的寫本在中國西北部敦煌的藏經洞中被發現。其中，包含各個品種的紙：從麻製的抄經紙、桑樹皮製的政府公文紙，到本地手工製作的粗紙，不一而足。經過過去五十年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其中一些紙張較爲準確的年代^①。從史料中，我們瞭解到當時造紙業的中心集中在今天長江以南的丘陵地區，即安徽、江蘇南部、江西和湖南一帶。這些地區將紙作爲貢品進獻給朝廷，而政府機構的運轉正需要大量用紙。僅戶部每年處理賦稅，就要消耗掉至少五萬張紙。

製作一部書，需要在一張約12英寸(30.48釐米)寬，18英寸(45.72釐米)長的紙上先劃出欄綫，然後再謄寫內容。之後，把寫好的紙頭尾依次粘連，形成連續的卷子，再裝上木制的軸，旋轉卷舒，稱之爲卷軸裝。另於一卷末尾的空白處，用堅韌的紙或絹做成封面。一般而言，一章之內容剛好寫在一卷之中。故書的裝幀形式發生改變後，仍襲用“一卷”來指一章。每十卷爲一秩，放入袱囊中以作收藏。雖然鑑賞家們很喜歡這樣的書，但是對普通人來說，這樣的書卻不便使用，不易貯藏，容易損壞。從敦煌發現的寫本來看，有的卷子甚至長達6英尺^②。

① 關於中國紙張的研究，可以參考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北京，1979)，其中，有許多超越西方早期研究之處，另外，此書還配有大量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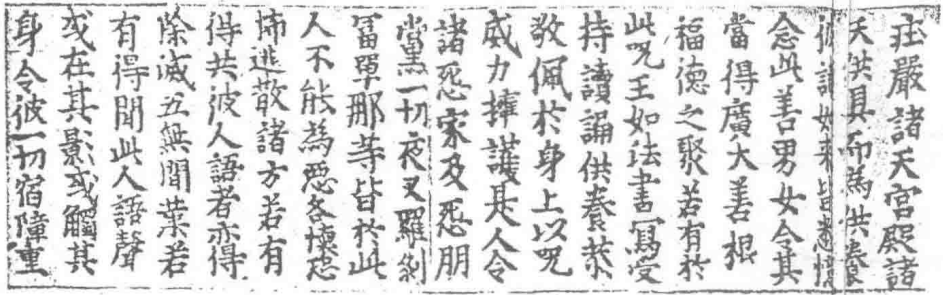
② 譯者案，6英尺相當於1.8288米。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

中國的印刷術究竟起源於何時，這始終是一個謎。早在漢代(前202—220)以前，中國人就開始使用印章，後來，又用稍大的木印大量複製道教的符。此外，還有用與印刷的原理相似的辦法，來捺印小的佛像。在新疆和甘肅，有賴於當地乾燥的氣候，在墓穴與遺址中發現有大量此類捺印的佛像。更大型的佛像，則可能是依循相近的辦法，由石刻上椎拓下來。而印刷的辦法是把紙張平覆於刷過墨的雕版之上，用乾燥的棕帚反復刷擦，印出佛像。存世的印刷出來的佛像和符咒，其時限可追溯到6世紀後半葉。我們讀到，曾譯述印度佛經、大名鼎鼎的玄奘(602—664)在此之後不久，也曾用這種方法印製過佛像。

最早的一批印刷品遺存，也恰恰與佛教有關，但它們卻不是在中國發現的，而是在韓國和日本。1966年10月，韓國在維修慶州佛國寺釋迦石塔的過程中，在塔中發現了雕版印刷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發現的實物僅存原經的三分之二，其寬約3.5英寸(8.89釐米)，以此推測，完整的經書可能長達20多英尺(約6米)。是塔建於公元751年，故此經刊刻的時間一定早於塔建成的時間。經中包含很多武周時期的造字，這些字行用於公元689至705年。經中還提到武則天建立的武周王朝，這個年限是690年到705年。因此，《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印製時間很可能早於公元705年。但是，武周時期的造字，直到公元9世紀還一直在使用，特別是在一些早期的經典之中，仍保存有這些造字。所以以上所述的幾項證據並不能最終推斷此經的刊印時間。可惜的是，現在能看的這部分《陀羅尼經》的複製品並沒有出現武周的造字^①。(插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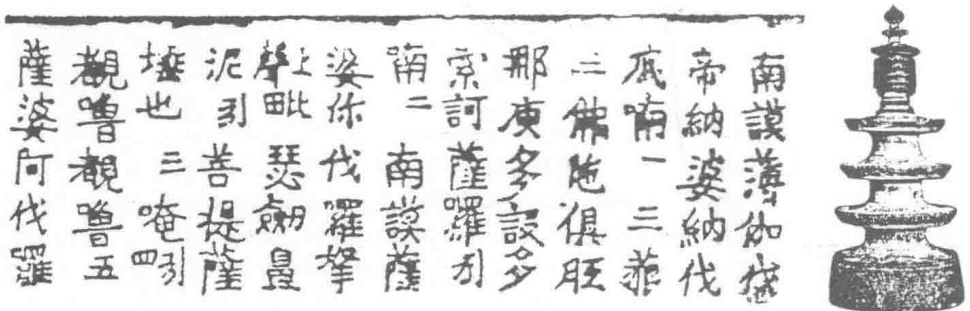
^① 關於韓國慶州大陀羅尼經的情況，可參考《韓國早期印刷史》(*Hanguk koinsoe sa*) (首爾：韓國圖書館科技研究中心，1976)，40—42頁。此件實物的印製時間可能比佛塔建成的時間早，而其中的武周造字，雖然其正式頒行的時間是689年12月至705年武則天退位，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此經一定在這期間印出。因為從敦煌發現的卷子中，我們可以知道這套造字直到公元9世紀仍在使用，尤其是在完全依照原本抄寫複本的時候。《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由吐火羅僧人彌陀山於704年翻譯成中文，故最初的譯本一定包含武周造的字，那麼在其後流傳的抄本、印本中仍然存在這些造字也並不奇怪。我在此感謝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的J. Byon，向我推薦了《韓國早期印刷史》一書，以及協助我尋找插圖的素材。



插圖一 現存世最早的印刷品，《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殘卷，1966年發現於韓國慶州佛國寺的釋迦塔中。此殘卷的時間斷限，必定早於751年，這是佛國寺和釋迦石塔建成的時間，而此經刻成的時間可能還要更早些

用紙張製作拓片的方法亦大行其道，在公元7世紀甚至更早，這一技術便用於傳拓儒家石經及其他刻在石頭上的文字。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椎拓興起於何時。

在日本同樣也發現了《陀羅尼經》印本，只是比上述韓國發現的那件時代稍晚。可是日本刊刻的《陀羅尼經》，技術水平卻不及韓國的。公元8世紀恐怕是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而中國佛教對日本的影響尤為深刻。在稱德天皇統治時期，宮廷實質上是由佛教僧人所把持。到公元770年，抑或之前，這位女皇為了慶祝內戰結束，在全國建造百萬座小木塔，在每座木塔內，放置一卷雕版印刷的佛教經咒，即《陀羅尼經》。複製陀羅尼經文，建造佛塔以守護聖迹，皆是習傳已久的祈求佑護的方式。這種虔誠的行為學自印度的阿育王。稱德女皇印製的經咒，雖然都是用中文書寫，但是是從梵文轉寫，其文字本身並沒有意義。而且這些經咒，並不是由人工手抄而成，而是雕版



插圖二 最早的日本印刷品。約公元770年，由稱德天皇后下令印刷的《陀羅尼經》，置於木制佛塔。由銅版雕版印刷。每個長22英寸(55.88釐米)，寬2英寸(5.08釐米)

印刷的。大部分經咒，連同放置它們的小型木塔，都留存下來。(插圖二)它們是由泥質的範所製成的銅板印刷而成。每個長22英寸(55.88釐米)，寬2英寸(5.08釐米)。

大致可以肯定，這種印刷的技術應是從中國傳入的，但是在中國卻沒有雕版印刷的實物流傳下來^①。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我們能讀到大量的文獻記載中國雕版印刷的情況。比如，在8世紀末到9世紀的唐代，中國就已經有雕版印刷的紙牌，而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一類印刷品。835年，國家頒布敕令禁止市場上銷售私自刻印的曆書，並稱此類曆書已經流布全國。這條法令，明確指出了非法出版曆書的集散地是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地區。848年，有記載記述了一位著名道教術士的傳記的刻印情況。在880年前後，一些位於東都洛陽的佛教寺院，開始印製院規。其中最長的一部院規，有800多頁，而且該寺還在考慮重新再刻印一部。865年，一位日本的僧人秀榮，帶着兩部雕版印刷的中文字書回到日本，其中一個有5卷，另一個則有30卷，都是在四川刊印的。

一位天朝官員的記述則進一步申明四川作為出版印刷的中心的重要性，

^① 有兩批印刷品實物，比慶州及稱德女王的《陀羅尼經》時限晚，一個是曾由湖北江陵一位楊姓先生收藏過的《開元雜報》的七頁零頁，其時間約為公元712—741。但是，它的年代無法判定。這部據稱是當時宮廷的“報紙”或“通知”的書，與唐代文人孫樵於841年所撰文章中曾提及的《開元雜報》極為相似。可是，一份官方的報紙，不可能印製得如此粗率。此件物品幾乎可以肯定是贗品。參看禿氏佑祥(Tosushi Ryūshō)《東洋印刷史序說》(京都：平樂寺書店，1951)，37—38頁；禿氏著《東洋印刷史研究》(東京，1981)，23頁。卡特(Carter)著，富路德(Goodrich)修訂，《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紐約，1955)，62頁。大毅光瑞探險隊1912年至1915年間於吐魯番地區發現相關實物，相較而言，則更有說服力。他們的發現中有《妙法蓮華經》印刷品的殘片，大字，字體精美。這些殘片很小，也不足以判定它們的年代，但是，從書的樣式來看，它們與在敦煌發現的9世紀印刷品類似，都留出了天頭、地腳。上原芳太郎(Uehara Yoshitarō)編《新西域記》(譯者案，杜希德書中所書書名為*Shin Saiiki*，書名實為*Shin Saiikiki*) (東京，1937)卷一，未編號插圖。在吐魯番，還發現了兩片稍大的殘片，同樣也是《妙法蓮華經》。其中一個作為善本，保存在京都的龍谷(Ryūkoku)大學；另一個由日本藏書家中村不則(Nakamura Fusetsu)收藏，直至他1943年去世。根據禿氏的研究，這些殘片都是屬於同一卷《妙法蓮華經》，是經共236行，每行24字。這些印刷品，雖然字體非常精美，却僅有4.5英寸(11.43釐米)寬。據說中村於1936年曾複製過他的這件藏品，並聲稱這件藏品是隋代(581—617)的印刷品。但禿氏認為中村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結論。根據長澤規矩也《和漢書籍的印刷及其歷史》(東京，1952)一書，中村所藏的殘片中還使用了689年至705年施行的武周造字，故長澤氏推測殘片的時限大約在8世紀早期到7世紀晚期，但是正如之前所述慶州《陀羅尼經》的情況，這些造字到9世紀仍然在使用，所以造字的使用並不能說明時間斷限的問題。但是，這兩片出自同一經書的殘卷，多少與9世紀的印刷品有所不同，即它們還沒有留出天頭、地腳。

當時正值881年，是由於黃巢起義，首都由長安遷至成都的下一年。在883年的另一處記述中，他提到在成都市中明顯有一個區域專門販賣各類雕版印刷書籍，諸如占卜、風水、解夢、字書，以及科舉參考書等等。這些書籍均由雕版印製，質量屬下乘，並且有很多違礙的章節。

從歷史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印刷業仍然只是一個地區產業，生產質量不高的印刷品，但是其在9世紀已經大規模地開始發展。印刷術也被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在印刷正式文件和宗教相關印刷品這一方面，雕版印刷技術在批量製作佛像、寺規時具有絕對的優勢，而且它能大大減少傳抄時可能產生的錯訛。佛教強調僧侶信眾要反復抄寫經文，作為一種修行和功德，借助雕版印刷技術，能省下不少人力。而生產諸如曆書、年曆等廉價的大眾印刷品時，使用這種簡便而快速的印刷技術，則能節省大量的開支。

早期書籍的出版與銷售

顯而易見，中國早就有書籍出版與銷售行業（二者在中古時期幾乎不可分割）。很早以前，中國便有從事書籍銷售的商人。早於印刷術產生幾個世紀的東漢，即王充所處的時期，當時的都城洛陽就有賣書的鋪子。到唐代，大城市中的市場，就在販賣各種手抄本、流行的詩歌集、拓片等等。公元9世紀早期，詩人元稹（779—831）就曾抱怨說有人靠鈔錄他和他朋友白居易的詩去換茶和酒。在白居易寫作生涯的早期，他曾經寫過一系列應付科舉考試的範文，在唐代都城長安（譯者案即今陝西西安）的書坊中賣給那些要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在東都洛陽，南市中有一片專門劃給書坊的區域。這些早期的書坊，應是經營手抄本的生意，可能會僱傭專門的抄手謄抄一些需要的書，另外也製作並販賣拓片。印刷術大大增多了可供應書籍的數量，並在接下來的一到兩個世紀裏改變了整個書籍出版業的面貌。因為手抄本不僅數量稀少，而且價格昂貴，因而學者只能完全依賴於一批好的藏書來做學問，不論這些藏書是自己家裏的，抑或是朋友或者是贊助人的，但是印刷術發明以後，邊遠地區的人也能看到書籍。印刷術，不僅僅能夠在一夜之間生產出大量廉價的書籍，而且一旦“印刷革命”展開，便彙聚了巨大的蔓延能力，使得到了12世紀，雕版印刷的書籍已經到處都是了。而它所帶來的長期社會效應更是猛烈且深遠。



插圖三 佛教經咒《陀羅尼經》，此經用梵文刊刻，1944年在成都一處晚唐時期的墓葬中發現，現由四川省博物院收藏，見《中國版刻圖錄》圖版一。刊刻時間不明，但是一定是757年以後印刷的。印刷品的右側空白處，有用漢文所書刻工的信息以及印刷地

敦煌的發現

我們瞭解9世紀中國印刷術發展的情況，僅限於文獻的記載。早期四川就有印刷術，已由1944年在成都一處晚唐墓葬中發現的印刷品得到確證。在墓主人身上系的一個銀質鈴鐺內發現了一印刷在紙上的佛教經咒，佛經是卷起來放入鈴鐺內的^①。經咒為梵文《陀羅尼經》，上面還有幾尊佛像。在這件印刷品右側的空白處，印有漢文的刻工的信息，已有殘損，但是可以依稀看出刻工為成都縣龍池坊的卞氏。從成都縣龍池坊這個地名可以推測，這件經咒的印刷時間大約在757年以後。可惜的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更為準確地判定更具體的時間。這件印刷品，現藏於四川省博物院，可能是現在中國留存下來最早的印刷品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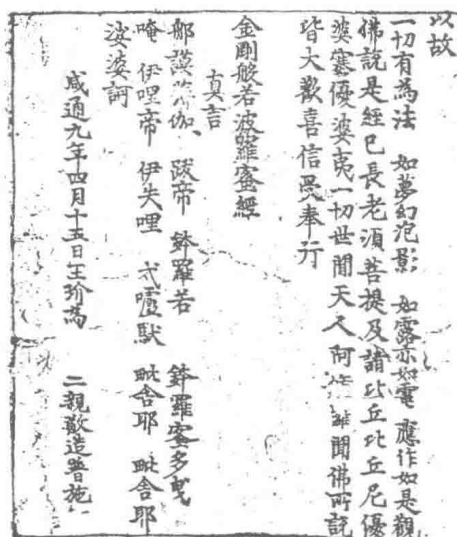
20世紀初，在甘肅省西北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中，發現了大批的寫本，以及一部分印刷品，這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早期印刷史的認識。其中最為著名

^① 譯者案，杜希德此處所用的詞為bell，直譯為“鈴鐺”，但是實際上在墓葬中發現的中間藏有《陀羅尼經》的實物，名為“釧”。

的印刷品，是868年刊印的《金剛經》，由英國人斯坦因於藏經洞中發現，現藏於大英博物館^①。前述在成都發現的《陀羅尼經》製作粗糙，僅比早期的佛像印得好一些。與《陀羅尼經》不同，《金剛經》印製極為精美，這顯示出並非所有的9世紀印刷品都質量低劣。在經文之前，有一副雕刻細膩的佛像版畫，作



插圖四A 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雕版印刷實物，《金剛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刻有明確紀年，即公元868年4月15日。此為卷首佛像，以及經文開頭



插圖四B 《金剛經》卷末，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① 見卡特著，富路德修訂，《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第二版），54—59頁。以及翟林奈（Giles）《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倫敦，1957），279頁，8083號，伯2。此書提及一594年的印刷品，後來發現其實是寫本，參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40—41頁）。

爲卷首，是圖由七塊雕版雕成。在佛像之後，是由一張張印有經文的紙粘連成卷，這與手抄本的裝幀形式完全一樣。整個卷子有16英尺(4.8768米)長，1英尺(30.48釐米)寬。可惜的是，卷子中所展現的信息並未透露此經印刷於何地，由誰人開刀雕刻的。斯坦因認爲這卷經文是從四川帶到敦煌的，但是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見插圖四A與B)

另一件印刷精美的卷子，屬“斯坦因收藏品”，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它是《妙法蓮華經》的殘卷，大約5英尺(1.52400米)長，1英尺(30.48釐米)寬。它的年代可能比《金剛經》更早些^①。另有一些人根據它的紙張，認爲這個印刷品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8世紀，但這個看法僅僅只是一個推測。除了斯坦因，伯希和也帶走了很多敦煌發現的文書。在這些帶到巴黎的文書中，有一件是著名的唐代僧人不空於公元8世紀中葉所翻譯的中文《陀羅尼經咒》。根據這件印刷品內部提供的證據，可以證實這是唐代的印刷品(案：早於公元907年)^②。另外一件同樣是這一時期的印刷品，則是僧雲辨所著《故圓鑑大師二十四孝壓座文》，現藏於大英博物館^③。

以上所有談及的印刷品都與宗教信仰有關。敦煌的發現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世俗印刷品。首先是一些印刷的曆書，而曆書的製作於公元835年就被朝廷禁止了。在敦煌發現的曆書中，有一件公元877年的曆書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插圖五A)^④。另一件公元882年的曆書殘片，由在成都府的樊賞家所刊印。這更明確地表明四川是當時印製曆書的中心(插圖五B)^⑤。還有一件曆書，大約爲9世紀晚期的印刷品。這件曆書就更有意思了，因爲該曆書稱是“上都東市大刀家大印”，上都即長安^⑥，也就是說，這件曆書是一個直接的證

① 見瞿林奈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79頁，8085號，伯13。又瞿林奈，《敦煌的六個世紀》(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倫敦，1944)，45頁。

② “伯希和收藏品”，《中國敦煌》，法國國家圖書館伯4501號。

③ 瞿林奈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80頁，8102號，伯1。又瞿林奈，《敦煌的六個世紀》，46頁。

④ 瞿林奈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80頁，8099號，伯6。

⑤ 瞿林奈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80頁，8100號，伯10。

⑥ 瞿林奈編，《英國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280頁，8101號，伯12。譯者案，瞿林奈此書稱這件印刷品爲“上都東市大刀家大印”(Large print of the Great Sword Family in the Eastern Market of Shang-tu)，或釋讀有誤，而杜希德則稱爲“the Great Jen family”，疑誤讀爲“刃”，而實際上此處應爲“刁”字。詳見周雯《評杜希德〈中國中古時期的出版與印刷〉》，《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一期，369—383頁。